

## 丹尼爾·笛福論英格蘭歷史中的 商業與宗教（1490-1730）\*

陳建元\*\*

### 摘要

本文討論英格蘭著名政論與小說作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宗教思想如何影響他對歷史的看法，笛福用《舊約聖經》以及基督教教會發展的歷史來強調，人類歷史之開展即是上帝意志之展現。本文第一部分將回顧既有研究並指出本文所要補足之處。第二部分則指出笛福格外推崇古代腓尼基人在航海和貿易方面的成就，他認為這與十八世紀英格蘭有許多相類之處。笛福詮釋兩個民族都在完成上帝的神意，要將上帝對人們的恩賜在世界各處散佈。第三部分接著探討摩西和希伯來人直接從上帝那得到了文字的知識，而這正證實了希伯來人作為被揀選的民族的地位。而英格蘭人由於信仰猶太—基督教，所以不會重蹈腓尼基人的覆轍，笛福詮釋英格蘭繼承了兩個古老民族的各自優點。第四部分則是從笛福詮釋英格蘭羊毛業自十五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的日益壯大來證明英格蘭乃是受上帝眷顧之民族。第五部分則從宗教改革來論述光榮革命之正當性，並指出作為新教徒的英格蘭比起天主教徒是更為接近神意的民族，英格蘭從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以降的國力提升與商業擴張正是有力的見證。第六部分結論則扼要總結全文論旨，並指出未來可繼續延伸之研究課題。

關鍵詞：丹尼爾·笛福、英格蘭宗教改革、英格蘭史、新教、神恩

---

\* 承蒙三位匿名審查人暨編委會提出的寶貴意見，使本文內容論證更臻完善，於此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 **Daniel Defoe's Analysis of Commerce and Religion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1490-1730)**

Chen, Chien-yuen\*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Daniel Defoe's (1660-1731) religious beliefs have shaped his view of history. Defoe believed that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manifested God's will, drawing from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The first section reviews existing research on Defoe's religious thought.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Defoe's admiration for the Phoenicians' achievements in navigation and trade, paralleling 18th-century England. He sees both groups to be fulfilling God's will to spread His gifts worldwide, suggesting God can use the accomplishments of pagan nations to benefit Christian nations. The third section highlights Moses and the Hebrews, who received writing directly from God, confirming their status as the chosen people. Defoe saw England, influenced by Judeo-Christianity, as inheriting strengths from the Hebrews and the Phoenicians without repeating their mistakes. Defoe explores the topic of God's favor towards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fourth section, by pointing out the flourishing wool industry in England. He sees this as a clear sign of divine benevolence, indicating that God is favorably disposed toward the nation. The fifth section argues that Defoe asserted that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ligned perfectly with God's will, primarily due to England's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Protestantism. The sixth section concludes and suggest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Daniel Defoe (1660-1731), English Reform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Protestantism, Providence

---

\* Assistant Professor (Contrac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Taiwan.

## 壹、前言

本文探討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宗教思想對其歷史作品的影響，而重點特別放在他如何詮釋希伯來人與腓尼基人的歷史。過去的學者多少有注意到笛福對兩個民族的連結。歷史學者凱薩琳·克拉克（Katherine Clark）解釋笛福目光之所以投向腓尼基人與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對英格蘭羊毛的重視，其目的是要藉此來強化他自己的論述，即英格蘭已經從封建社會過渡到商業社會。<sup>1</sup> 而且克拉克業已注意到笛福思想中重要的原創性，這從笛福是近代早期英格蘭作家中，首位將羊毛詮釋為社會變遷的重要催化劑可見一斑。<sup>2</sup> 學者羅伯特·梅瑞特（Robert Merrett）也注意到笛福如何在作品中運用矛盾反差的手法來推進其論述，像是笛福對1640年代內戰以及光榮革命的紀念日時便解釋道，英格蘭歷史上的這些重要日子反映出歷史中上帝之介入，並指出人如何行事方能得到救贖。<sup>3</sup> 寶拉·巴克夏德（Paula Backscheider）的研究則指出笛福的歷史著作都有著精心設計，其篇章的架構皆與其想要傳達的訊息緊密連結。巴克夏德指出了笛福如何運用上帝意旨為名義來解釋歷史。舉例而言，英格蘭與蘇格蘭兩個王國在1707年的合併，被笛福詮釋為「神意計畫的展現」，以及「上帝親手帶領這兩個國家前進」。<sup>4</sup> 她認為，從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笛福的歷史寫作是要在看似雜亂無章的人類歷史漫長進程中，探索神性的展現及其展現的細節。巴克夏德之論點與本文特別相關之處在於：她指出笛福根據其基督教信仰以及對上帝之詮釋所做出的詮釋是：上帝將整個世界設計為充滿各種事物的寶庫，人類必須竭盡心思充分妥善地運用，這才是榮耀上帝的正確之道，也唯有如此才可以享用它們。<sup>5</sup> 巴克夏德這點觀察相當重要，因為這有力地解釋了為什麼笛福在作品中不斷地稱讚腓尼基人商業和航海之發展。

---

<sup>1</sup> Katherine Clark, *Daniel Defoe: The Whole Frame of Nature, Time, and Provide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7), p. 163.

<sup>2</sup> Katherine Clark, *Daniel Defoe*, p. 176.

<sup>3</sup> Robert James Merrett, *Daniel Defoe: Contrari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p. 92.

<sup>4</sup> Paula R. Backscheider, *Daniel Defoe: Ambition & Innovation*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6), p. 83.

<sup>5</sup> Paula R. Backscheider, *Daniel Defoe: Ambition & Innovation*, p. 110.

上述眾學者之研究已經討論了笛福歷史著作的宗教面向，本文針對這些作者提出以下兩點修正。首先，儘管克拉克注意到並討論了笛福對腓尼基人的偏好，不過她認為這樣的偏好是受到華特·雷利（Walter Raleigh, 1552-1618）這位作者的影響。除了雷利之外，本文另外指出，笛福的思想資源還包括其他幾位著述古代歷史的作家，藉此除了補充笛福作品參考的面向外，也將笛福放入十七世紀中葉起，英格蘭作家開始關注猶太、希臘羅馬等古代智慧（ancient wisdom）的歷史脈絡中，本文並將以笛福探討「文字」是如何被發明為例證來說明。這在當時是許多作家皆著墨措意的一個問題，笛福與其他作家相當關心在人類歷史上究竟是那個國家首先發明了寫作，他在這場爭論中並不只是像巴克夏德所言的跟隨華特·雷利，還批判性地使用了其他作家如皮耶·丹尼爾·輝特（Pierre Daniel Huet, 1630-1721）的作品，對此，本文在以下第三節將以「寫作」的發明為例來說明。此外，從他對於不同史家著作與史料的剪裁，亦可以看到笛福歷史思維中的巧思。其次，本文討論英格蘭在商業的天賦以及精神上繼承了腓尼基人，但是卻可以避免重蹈他們的覆轍，其中最關鍵之處便是英格蘭的宗教改革。

## 貳、笛福論古代歷史：腓尼基人的貿易和航海史

在回顧了既有學者對於笛福著述中關於歷史與宗教的成果後，本節將以笛福如何詮釋腓尼基人歷史為討論核心。笛福對於腓尼基人的評價頗高，這點迥異於當時其他作家，這主要是因為笛福對於他們的商業成就推崇有加。在種種商業成就中，笛福格外強調他們的航海和貿易成就，因為這有利於世界各地人們互通有無，而這也是本節所要探討之處。

笛福討論古代歷史時仰賴許多資料來源，過去的研究並未對笛福所運用的歷史深入分析。他多次引用的一位作家便是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例如，笛福對於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神話的闡述便是根據培根的作品與解釋。培根認為普羅米修斯盜火的這個神話故事很清楚地展現了上帝之意志，此外故事的寓意在於人類往往得意忘形，忘記自己的成就是來自於上帝的恩賜，普羅米修斯最

終在漫長時光中不斷地被鷹啄食肝臟的痛苦下場便是一種警訊，警告人類不要企圖以不完美的人類能力與上帝的全知全能相提並論。<sup>6</sup> 笛福在述說普羅米修斯的神話時，跟他的許多著作引用故事時一樣並未提供註腳，不過他的解釋跟上述培根的解釋完全相同，笛福指出：「在普羅米修斯以前，人類的文明程度跟一團泥土無異，如此地無知、野蠻以及愚蠢，完全不具備任何超自然知識」，而在普羅米修斯出現後，多虧他將「上帝的智慧以及對真神的知識」帶到世界上，人類在知識與科學上才開始有所進展。<sup>7</sup> 笛福基於此來解釋人類文明發展背後的主導者便是上帝，人類若是對上帝不懷抱感恩心情以及虔誠態度，遲早再次陷入普羅米修斯痛苦的命運。

因此，上帝在笛福的歷史思想中會直接介入人類世界，祂雖然會給予恩賜，但也會在人類不知感恩時施予懲罰。本文基於此認識，繼續討論他對腓尼基人的論述。腓尼基人是笛福在討論古代歷史時十分感興趣的主題。他經常稱頌他們在貿易、工藝、科學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並且把這優秀民族與笛福自己的國家英格蘭連結在一塊。笛福也因此特別著墨腓尼基人是如何獨特地在距今遙遠的時代便投入羊毛產業，甚至已將這個產業推進到相當成熟的階段。<sup>8</sup>

笛福探討貿易、工藝的最主要著作是《發現和改進的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本書於1725-26年出版，可分成四個部分，先後論述了大洪水後的時代、商業與航海的肇始、迦太基人和腓尼基人、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356 B.C.-323 B.C.）、絲綢和羊毛製造業的開始、羅馬和中世紀的發展、英格蘭羊毛貿易的崛起、人類知識的增長、美洲的發現等等。笛福在書中指出上帝將其對人們的恩賜散佈在世界各處以促進人類對其之發現，並且彼此能夠強化交流。重視商業的腓尼基人無疑完成了這個神聖的使命，而一心征服的羅馬人則忽視了此點。笛福在書中指出，羅馬衰弱之後，商業之所以能夠再次繁榮，乃是奠基於基督教在歐洲各地的傳播，及其對正直和誠實這些美德的鼓勵。<sup>9</sup>

---

<sup>6</sup> Francis Bacon, *The Essays, or Councils, Civil and Moral, of Sir Francis Bacon, Lord Verulam, Viscount St. Alban. With a Table of the Colours of Good and Evil and A Discourse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London: H. Herringman, 1696), pp. 74, 77.

<sup>7</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in P. N. Furbank, ed.,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Vol. 4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p. 79.

<sup>8</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p. 70.

<sup>9</sup> Katherine Clark, *Daniel Defoe: The Whole Frame of Nature, Time, and Providence*, p. 163.

腓尼基人是笛福在討論古代歷史時相當醉心的主題，笛福稱讚他們在貿易，藝術和科學方面取得的相當成就。這表現在他格外強調腓尼基人如何投入羊毛業，以及他們如何將羊毛業帶到相當高超的境地。<sup>10</sup> 笛福對於腓尼基人的說法大多沒有附上他的資料來源，不過其論點在很多層面都與皮耶·丹尼爾·輝特於1717年在英格蘭出版的英譯本《古代商業和航海史》（*The History of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Ancients*）相似，基於兩人說法的相似性，這是一個可能的參考來源。

笛福與輝特的說法有不少相近之處。例如，雖然根據歷史記載，迦太基（Carthage）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便與腓尼基脫離關係獨自發展，而且腓尼基人後來接連被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 c.642 B.C.-562 B.C.）與亞歷山大大帝所征服，實際存在下去的是迦太基人。不過無論是在丹尼爾·輝特或是笛福的作品中，基本上將兩個民族畫上等號。輝特稱呼這個民族是「商業的始作俑者」（the Authors of Commerce），他們與東方世界無論是在海路或是陸路上都頻繁貿易，並且建立了為數眾多的殖民地。<sup>11</sup> 笛福與輝特都認為腓尼基人是世界上第一批具備航海技能的人，而且是他們將此技術推廣到其他文明：「腓尼基人……和奇里基亞人（the Cilicians）」是「首先定居於海邊的國家」，並且正是他們將航海技術傳承給了埃及人和希臘人。<sup>12</sup> 此外，兩位作家也都不約而同地主張腓尼基人是人類歷史上的商業先驅。笛福寫道：「商業的最初交流，一般說是在泰爾人（the Tyrians）」<sup>13</sup> 這個天性喜好買賣的民族與埃及人之間進行的」；在同一頁中，笛福還寫道，腓尼基人「相當勤奮，並且深深著迷於商業。」<sup>14</sup> 除了輝特之外，笛福另引用了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 64 or 63 B.C.- c.24）的著作，將腓尼基人與英格蘭人聯繫起來。笛福根據斯特拉波的說法來論述，腓尼基人在古代就已經抵達英格蘭，並且

---

<sup>10</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p. 70.

<sup>11</sup> Pierre-Daniel Huet, *The History of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Ancients* (London: B. Lintot and W. Mears, 1717), pp. 16-17.

<sup>12</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p. 68. 笛福還指出奇里基亞人是最先發明可航行的船隻的人，見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p. 46.

<sup>13</sup> 腓尼基人中的一支。

<sup>14</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p. 68.

他們之間存在貿易關係。尤有甚者，腓尼基人在這個時代便已經將羊毛製造技術帶到了英格蘭。

笛福之所以關注和討論腓尼基人，其中一個動機在於認為這個古老民族的繁榮與成長是上帝對他們安排之計畫的展現，所以是人類探究神意的重要材料。腓尼基人的商業成功以及人口成長，在笛福看來，就是因為他們「遵守他們造物主的指引」努力地生產以「遍滿地面」（《創世紀》一章二十八節之典故）。腓尼基人商業交易量的增加以及陸續在迦太基、西頓（Sidon）等不同地方建立起新的殖民地，這些無不呈現出他們努力完成上帝對他們的安排，藉此榮耀上帝。<sup>15</sup> 腓尼基人在古代便能夠駕船抵達美洲，雖然他們被征服後，先後受到希臘人與羅馬人的長期統治，逐漸與其他民族融合，其成就逐漸為世人所淡忘，但笛福認為腓尼基人的成就仍清楚地展現出上帝對於他們的喜愛以及眷顧。此外，上帝對於他們特別的安排與眷顧亦表現在他們在航行中將各種「植物以及藥物」帶到世界各地，同時將最早的航海技術傳播到世界各地。笛福相信腓尼基人的兩支後裔——西頓人（Sidonians）以及泰爾人的高超航海技術以及「勤勞與技術」，都完整地被英格蘭吸收與繼承。<sup>16</sup> 笛福由此進一步指出，由於古代腓尼基人是如此地被上帝眷顧，而英格蘭完整地繼承了腓尼基，在航海、商業各方面都與他們極為相似，因此英格蘭人無疑也是上帝所眷顧的對象。

儘管腓尼基人是異教徒，但是笛福正視並且稱讚他們在商業以及航海上的成就。他稱腓尼基人的成就是「航海技藝的肇始」。<sup>17</sup> 學者已經指出笛福多少避免去提腓尼基人作為異教徒的這一事實。克拉克便指出，笛福雖然參考了《以西結書》當中關於腓尼基人在航海中的成就，卻沒有提及其中上帝要懲罰腓尼基人、讓他們必然毀滅的這部分經文。<sup>18</sup> 例如《以賽亞書》二十三章九節，耶和華決定要污辱泰爾「高傲的榮耀」並且使這裡「一切的尊貴人被藐視」；以及《以西結書》二十八章二節，耶和華譴責泰爾的領導者：「你雖然居心自比神，也不過是人，並不是神」。從笛福對於《聖經》鉅細靡遺的閱讀方式，例如密集地引用《以賽亞書》以及《以西結

<sup>15</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p. 77.

<sup>16</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p. 78.

<sup>17</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p. 60.

<sup>18</sup> Katherine Clark, *Daniel Defoe*, p. 168.

書》，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在經文中原本緊密相連的語句，被笛福刻意跳過了腓尼基人被上帝懲罰的段落，而只挑選讚頌腓尼基人商業的文句。

笛福此種對於腓尼基人讚頌的態度在同時代的英格蘭作家當中獨樹一格。我們若是檢視當時其他牧師的講道詞，很清楚可以觀察到他們提到腓尼基人時，很一致地都是負面的說法。在那些講道詞中，泰爾城和腓尼基人經常與由驕傲帶來的負面結果聯繫在一起。例如，風俗改善協會（The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笛福也有參與此運動）於1694年所出版的如何改善風俗的著作中，便將泰爾與所多瑪與蛾摩拉（Sodom and Gomorrah）並列，認為都是激起上帝怒氣的負面示範。<sup>19</sup>又例如在1698年的一次講道中，與笛福同為不服從國教新教徒（the Dissenters）的牧師約翰·豪（John Howe，1630-1705），同樣將泰爾與西頓和所多瑪與蛾摩拉並舉，認為這些城市的居民都是心中充滿「污穢與麻木不仁貪慾」的人群。<sup>20</sup>相比之下，笛福對於腓尼基人走向衰亡的解釋則相對模糊，儘管他引用了以賽亞的預言還有《以西結書》二十八章二節的批評之詞，批評他們自以為「在海中坐神之位」，<sup>21</sup>亦承認根據這些聖經相關段落，驕傲（pride，在近代早期往往含有強烈自愛之意）確實是腓尼基民族衰亡的主因；但是笛福仍然盛讚這個古老民族在航海以及商業上的卓越成就，他不過是委婉地指出了異教文明在發展上終究有其極限。很遺憾地，腓尼基人所仰賴的只是「自然宗教的原則」，於是「它接著便進一步地陷入了巫術與占卜（Sorcery and Southsaying）當中」。這種困境並不僅限於腓尼基人，在笛福的解釋裡頭，其他異教徒文明也面臨到相同的難題，像是「迦勒底人（Chaldeans）、迦太基人以及羅馬人」。<sup>22</sup>

<sup>19</sup> 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Proposals for a National Reformation, of Manners: Humbly Off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Our Magistrates & Clergy* (London: John Dunton, 1694), p. 8.

<sup>20</sup> John Howe, *A Sermon Preach'd Febr. 14. 1698. And Now Publish'd, at the Request of the Societies for Reformation of Manners in London and Westminster* (London: S. Bridge, 1698), pp. 29-30. 關於十七世紀英格蘭宗教文獻中將泰爾與所多瑪與蛾摩拉並列的傳統，參見 Alexandra Walsham, *Providen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90-298.

<sup>21</sup>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Literature* (1726), p. 235.

<sup>22</sup> Daniel Defoe, *A System of Magick* (1727), in Peter Elmer, ed., *Satire, Fantasy and Writ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Vol. 7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p. 157.



然而，笛福對腓尼基人的偏好仍然多過其他民族，而且經常將英格蘭人與腓尼基人相提並論。這樣子的偏好與連結有幾重原因。首先，雖然希伯來人方為上帝之選民，不過腓尼基人在世界上同樣是要完成上帝所賦予的任務。正如學者所指出，笛福論述腓尼基人的勤勉、理性以及實際態度讓他們得以有效地利用上帝所賦予的資源，並且將這些所得與成果分享給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sup>23</sup> 第二，笛福雖然將腓尼基人的衰亡歸因於他們的自傲以及異教信仰，但是他也指出腓尼基人的衰亡同時也是上帝計劃中的一部分。這個計畫的核心與弔詭之處在於，唯有當腓尼基人滅亡，他們的知識以及貿易上的巧思發明才有可能散布到世界各處。在笛福對於歷史的詮釋中，他認為荷蘭人的亞麻手工業、法蘭德斯的羊毛業，都多虧了從北非逃難至此的腓尼基人後裔迦太基人。<sup>24</sup> 腓尼基人所積累的這些知識啟蒙了許多國家，讓這些國家追求同樣的勤勉與發揮，並且仰賴貿易維生。在腓尼基帶來商業、航海知識以前，「他們很可能對於這些事情一無所知」。<sup>25</sup> 最後一點，笛福這種對腓尼基人的偏好係根據他所抱持腓尼基人乃是古代的英格蘭人的信念。這一點會在本文接下來關於伊莉莎白一世的部分加以解釋。

要言之，笛福認為法蘭德斯羊毛業以及亞麻業的製造技術是腓尼基的難民在其國家滅亡之後所帶過去的。在十五、十六世紀中葉以前，這個地區是歐洲、甚至是世界上這類產業最為先進的地區。然而，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英格蘭的羊毛產業逐漸超越法蘭德斯。這首先是因為在伊莉莎白女王（Elizabeth I, 1533-1603）統治期間（1558-1603），西屬尼德蘭的新教徒受到壓迫而逃到英格蘭，使得英格蘭羊毛製造業大幅進步。而1685年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廢除《南特敕令》之後，這群受迫害的新教徒（Huguenots）逃亡至英格蘭，同樣提升了英格蘭在工藝、手工業各方面的專業知識，而羊毛生產技術便是其中之一。<sup>26</sup> 本文要論證的是，笛福對於伊莉莎白女王對歐陸新教徒難民政策的稱讚，有一部分源於笛福的父祖輩便

<sup>23</sup> P. N. Furbank, "Introduction," in P. N. Furbank, ed.,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Vol. 4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p. iii.

<sup>24</sup> Daniel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1728)*, in John McVeagh, 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7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p. 185.

<sup>25</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p. 72.

<sup>26</sup> Warren C. Scoville, "Minority Migrations and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4, 1951, pp. 350-351; William J. Ashwor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State, Knowledge and Global Trad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7), pp. 47-48.

是這群難民中人，因此笛福對腓尼基人的稱頌也可以從此背景加以理解。此外，由於腓尼基覆滅的主因之一是因為他們的異教信仰，十八世紀英格蘭作為一個新教國家，無疑比起腓尼基人處於一個更有利且適當的位置，能夠完成腓尼基人未竟之事業。

### 參、被揀選之民族：希伯來人的歷史與文字知識之意義

腓尼基人雖然在商業上完成了上帝對他們之安排，但是由於他們終究是異教徒，因此終究還是在完成其任務後便步上被毀滅之命運。笛福認為英格蘭人就是信仰耶和華的腓尼基人。換句話說，英格蘭承繼了腓尼基人的商業天才，同時也繼承了希伯來人的信仰遺產。上文已經討論了腓尼基，接下來便將探討笛福對希伯來歷史之解釋，以及透過文字起源之辯論來觀察笛福如何論證希伯來人乃是上帝之選民，以及英格蘭既具備商業傳承，又接受了猶太教所開啟之一神信仰。從英格蘭在他那個時代取得的進步看來，英格蘭是這兩個古老民族的真正繼承者。

笛福關於人類文字起源之探討，雖然散見於其雜誌及各類小冊子中，不過當中一個集中討論之處是他於1726年出版的《文學論》（*An Essay upon Literature*），笛福在其中堅持人類的寫作技能是由上帝直接賦予摩西。此外，《文學論》中另一個重點則是探討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他認為如果沒有印刷術，就沒有多少人會知道世界上曾發生的事情。

笛福對於腓尼基人的稱頌可以被放到更寬廣的時代脈絡來研究。迪米崔·列維廷（Dmitri Levitin）的研究指出，古代民族像是希伯來人、腓尼基人在文化上所留下來的遺產在十六、十七世紀時發揮重要影響力，是引領當時文人思索與論述的關鍵思想資源。也因此十七世紀的作家們在寫作各類議題時，經常會就如何詮釋古代思想與作品彼此爭論不休。其中一位重要作家便是上面曾提到的輝特。像是在文字、書寫系統的發展上，輝特便相信文字以及一些重要的文明技術突破是從腓尼基人而來的。這些成就後來隨著希伯來人流亡到埃及而傳入該地再接著傳布到其他地區。

<sup>27</sup> 列維廷也指出，西奧菲勒斯·蓋爾（Theophilus Gale，1628-1678）也主張人類文明的起源者是希伯來人，他當然也認為文字的起源應該溯及希伯來人。笛福在這一點上引述並且同意蓋爾的說法「合情合理」。<sup>28</sup> 笛福相信希伯來文字是最純淨以及最早的文字，因為這是在《聖經》中清楚地記載由上帝所直接賜予他們的。腓尼基人、埃及人、巴比倫人對於文字與天文的知識都是學習自希伯來人。笛福結論道：「埃及人以及腓尼基人對於文字的知識都是從摩西那神聖的起源而來的」。<sup>29</sup>

這種有關於文藝與技術發展皆來自希伯來文明之信念，也體現於笛福十分讚賞並且多次引用的作家華特·雷利的作品。雷利的想法是無論是古埃及或是古希臘的文字皆淵源自古希伯來人。他寫道，希伯來人將「文字傳給埃及人」，不過有別於笛福，他主張文字的發明者不太可能是摩西。<sup>30</sup> 他認為在古代的歷史學家往往將民族或國家的成就歸因於領導者，這應該就是摩西的情況。此外，雷利解釋說發明之所以被歸因於摩西，理由就是古代希伯來人希望摩西這號人物被後世所銘記。不過，雷利認為歷史的實際情況應該是文字乃眾人集體逐漸發展出來的成果，而之所以被歸功於領袖身上，則是後世為了紀念之故。笛福的想法大體上接近於他所推崇的雷利。笛福雖然提及《聖經》中關於摩西在西奈山上領受十誡的記載，因此主張摩西是最先擁有文字知識之人類；但是笛福也並不否認這種呈現方式也可能是當時希伯來人將民族成就歸功在摩西身上的作法。

笛福與雷利對於神話人物赫密士·崔斯墨圖（Hermes Trismegistus）的看法亦很相似。這個古代作家一般被視為是《赫密士文集》（*Hermetic Corpus*）的作者，而笛福跟雷利都說這個人是摩西的同時代人，或者甚至有可能是摩西本人，雷利說崔斯墨圖對於文字的知識都是來自於摩西，笛福也認同這個說法：「如果崔斯墨圖使用文字的話，很有可能他是從摩西那裡學習來的」。<sup>31</sup> 此外，笛福所使用的其他史料，展現出他閱讀範圍涉獵廣泛。例如他引用西班牙學者胡安·路易斯·維渥

---

<sup>27</sup> Dmitri Levitin, "John Spencer's *De Legibus Hebraeorum* (1683–85) and 'Enlightened' Sacred History: A New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76, No. 1, 2013, p. 58.

<sup>28</sup>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Literature* (1726), p. 251.

<sup>29</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p. 80.

<sup>30</sup> Walter Raleigh,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Walter Burre, 1614), pp. 318–320.

<sup>31</sup>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Literature* (1726), p. 253.

斯（Juan Luis Vives，1493-1540）的說法：「摩西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並且是文字的發明者，他將此發明推廣至所有希伯來人，然後腓尼基人再從後者之處學習」。<sup>32</sup> 另外一個笛福討論古代希伯來人時經常使用的史料則是法國學者路易斯·莫雷利（Louis Moreri，1643-1680）所編的辭典。莫雷利相信希臘文字發明者是卡德摩斯（Cadmus），他是希臘神話中，出身腓尼基、建立底比斯城的英雄；而卡德摩斯的文字知識又是學習自腓尼基文字（而這再上一層的根源便是希伯來文）。笛福也同意莫雷利的看法，認為卡德摩斯並非首創者，而是學習自希伯來文；卡德摩斯雖然是首先將原本由右至左的寫作方向改變為相反方向的倡導者，但是他充其量是改良者，而非發明者。<sup>33</sup>

根據以上討論，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文字淵源乃是笛福歷史著作當中一個重點，而笛福之所以專注討論文字起源，則是試圖藉由文字的起源及其在各文明之間的傳遞來證明世界上充滿著上帝的意志與祝福。他相信文字起源於摩西在西奈山上所領受的兩塊石板，而這便是人類書寫系統的起源。笛福討論這些聖經中的記載並非出於單純的宗教情懷或是知識追求，還有一個重要目標是要反駁他始終懷抱敵意的自然神論者約翰·托蘭（John Toland，1670-1722），後者認為人類文字起源民族應該是埃及人以及腓尼基人。<sup>34</sup>

學者喬伊·瑞德（Joel Reed）在其研究中已經注意到，笛福在文字起源這個議題上反駁自然神論者，特別是自然神論者對異教徒文明之稱頌。瑞德指出，有關文字的討論，笛福便是針對著托蘭而來。雖然瑞德說的大體不錯，但是有一些細節需要加以澄清。首先，瑞德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1718年首次印行的小冊子《為報刊輿論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Press*）一書，然而大多數學者皆不肯定這本書是笛福的作品。此外，笛福雖然稱讚那些寫字優美優秀的英格蘭學者，但是根據上下文，笛福其實是要諷刺英格蘭庶民寫字水準的低下。他驚異於「在他所遇到的庶民當中，每個人的拼字都如此低劣，而且他們口中所說的英語的發音都糟糕透頂」。

<sup>32</sup>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Literature* (1726), p. 251.

<sup>33</sup> "Cadmuis" in Louis Moréri, *The Great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Genealogical and Poetical Dictionary*, trans. Jeremy Collier (London: Henry Rhodes, 1701).

<sup>34</sup> Joel Reed, "Nationalism and Geoculture in Defoe's History of Writing,"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56, No. 1, 1995, p. 31.

<sup>35</sup> 笛福在其著作當中其實並未要把書寫文字之能力抬高到像是瑞德所說的高度。笛福更為看重的是商業技術的進步。所以，若要說神意對於英格蘭的眷顧體現，其最顯著之處與其說是瑞德所著眼的文字書寫技術，更不如說是英格蘭繼承了腓尼基人（在笛福的思考中也包括了迦太基人）的商業天才以及繁盛發展。

腓尼基人在技術發展上貢獻良多，儘管他們最終被征服滅國。笛福給予他們的歷史角色便是中介性——他們的技術將會在別的民族手中發揚光大。雖然腓尼基人在笛福筆下並不是許多技術的發明者，但是笛福盛讚他們是這些技術的優秀改良者。正如前述，笛福跟雷利的意見相同，兩人皆主張首先使用文字的人是摩西（或說是首先集大成者），並且傳授給希伯來人；接著腓尼基人以及其他鄰國跟著學習，而後腓尼基中的一些希臘人（即卡德摩斯）將這套系統帶回希臘。<sup>36</sup> 笛福同意所有的文字都「源自希伯來人」。<sup>37</sup> 換句話說，腓尼基人對於文字的知識同樣承襲自希伯來人，腓尼基是在文字的改良者而非發明者。笛福堅信於此，同樣從他如何引用另外兩位學者蓋爾以及薩繆爾·柏夏（Samuel Bochart, 1599-1667）的言論可見一斑。這兩位學者皆認為古代人的文明成就、異教徒的文明成就都承自希伯來人。<sup>38</sup> 不過笛福與他們最不同之處在於，他接續前輩學者的說法，進一步說出腓尼基人的成就在於將當時的希伯來文改進為拼音字母系統，而不是每一個字本身有不同的讀音（類似於中文），並且影響了全世界在日後皆開始採納拼音系統。<sup>39</sup> 根據這一點，笛福便反對蓋爾將世界上重要的人類文明成就都源於希伯來人的說法。蓋爾說大洪水以前的人類智慧，是上帝創世的「神聖產物」（divine product），並且持續存留在世界上，人類世界各地往後的文明都有向其學習，都有多少接觸其最初的神聖源起。<sup>40</sup> 笛福並未全盤接受這樣的說法：他僅同意最初使用文字的人群確實是摩西所

---

<sup>35</sup> Defoe, *An Essay upon Literature* (1726), p. 299.

<sup>36</sup> Walter Raleigh,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p. 319.

<sup>37</sup> Defoe, *An Essay upon Literature* (1726), p. 253.

<sup>38</sup> Dewey D. Wallace, *Shapers of English Calvinism, 1660-1714: Variety, Persist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92.

<sup>39</sup> 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4, Barbarians, Savages and Empi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71.

<sup>40</sup> Stephen J. Pigney, "Theophilus Gale and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in Tom Sorell, Graham Alan John Rogers, and Jill Kraye, eds., *Insiders and Outside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78.

領導的希伯來人，但是他會將其他文明技術的發展歸功於不同民族，而不像蓋爾將全部都追溯自希伯來人。舉例而言，正如上文已詳述的，最為擅長並且不斷精進航海與商業技術的民族乃是腓尼基人。

### 肆、歷史中的神意：英格蘭作為上帝眷顧的國家

承前文，笛福認為英格蘭分別繼承了腓尼基人與希伯來人這兩個古代民族的優點，這尤其表現在他詳細討論並歌頌英格蘭羊毛業、英格蘭宗教改革，以及 1688 年新教徒威廉三世（William III，1650-1702）與瑪麗二世（Mary II，1662-1694）取代了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James II，1633-1701）等事。

笛福相信歷史充滿了上帝的悉心安排與計畫。不過他並不會平鋪直敘地說出，因為他認為神意需要聆聽，必須從一些蛛絲馬跡中去觀察。上述的文字、或是腓尼基人的航海技術都是例子。而笛福認為英格蘭乃是上帝揀選並且特別眷顧的國家，因此在英格蘭的歷史上也必然會有許多例子可以看出這點。舉例而言，在十八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英格蘭與法國幾乎年年作戰，在 1708 年的一次戰鬥中，英格蘭軍解救了當時被包圍的布魯塞爾，這次行動之所以成功的關鍵在於這一年的冬天較晚降臨，因此英格蘭得以有足夠的時間作戰而無需撤軍。笛福的解釋是這種有利的天氣便是「上帝的直接介入，其目的就是要解救這次圍城」。<sup>41</sup> 相反的，1706 年英軍的軍事行動因為氣候嚴峻而被迫停止之時，則被笛福解釋為「是上帝之手的直接介入」，是上帝在事態尚未惡化之時給予英格蘭的警告，讓他們可以在收到警訊之後，採取適當且合理的進攻策略。他們必須先檢討是否做了任何不敬神的事情，笛福寫到，軍隊以及國王應該要紆尊降貴，盡快懺悔與祈禱。<sup>42</sup> 此外，笛福還會用異常天氣作為神意的展現，進一步比較英格蘭在 1706 年當時的政治領袖與聖經人物，藉此強化他們的合理性。當時英軍對法軍的指揮官是第一代馬爾博羅公爵約翰·邱吉

<sup>41</sup> Daniel Defoe, John McVeagh ed., *Defoe's Review*, 9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Vol. 5, p. 465.

<sup>42</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3, p. 542.

爾（John Churchill，1st Duke of Marlborough，1650-1722），笛福描繪他在戰場上如有神助，就像是舊約當中的約書亞一般，因此神讓「太陽靜止不動」，從而讓馬爾博羅公爵打勝仗。在其他不同地方，笛福都寫道：「在更多其他的環境當中，神意都巧合似地一齊發生」，幫助馬爾博羅公爵作戰。<sup>43</sup>

學者曼紐·肖恩（Manuel Schonhorn）注意到笛福在他最早期的著作當中曾經抄錄了理查·諾爾斯（Richard Knolles，1545-1610）、普魯塔克（Plutarch，46-119）以及其他歷史家的著作。肖恩接著指出，笛福特別注重古代君主的治理風格，像是塞利姆斯（Selymus，1467-1520）與古雅典將軍伊菲克拉特（Iphicrates，c.418 B.C.-c.353 B.C.）如何處罰粗心大意的士兵。肖恩據此便說笛福展現出「對於指揮官以及軍令上下體系的激賞。」<sup>44</sup> 不過肖恩沒有提到的是，這些古代君王的描述有可能是笛福從培根的〈論帝國〉一文所閱讀到的，笛福與培根都引用了上述的幾位特定古代君主，在其他笛福經常引用的史書，或是其他英格蘭作家中並未同時出現塞利姆斯和伊菲克拉特，更不用說兩人懲處士兵的細節故事。<sup>45</sup> 關於肖恩宣稱笛福重視上下階層、認為國王就應該是至高無上的指揮官，這樣的論點實有可修正之處。首先，他沒有指出笛福讚揚的戰士國王都是新教徒，像是威廉三世以及瑞典的卡爾十世（Charles X Gustav of Sweden，1622-1660）；至於異教徒的君主，無論是亞歷山大大帝、帖木兒（Timur，1336-1405）、尼祿（Nero，37-68）等等，笛福都是抨擊其野心，以批判性言論居多的。此外，笛福並非像肖恩所說的讚賞他們，而是相反的將這些人作為警惕。像是尼祿、戴克里先（Diocletian，c.244-311）等人都被笛福描述為被上帝攻擊，以致不得好死；塞利姆斯在笛福的筆下則是「土耳其史上最為暴虐的皇帝……對於基督教世界充滿了敵意」。<sup>46</sup> 可見笛福對於這些國王並不如肖恩所說的富有好感。肖恩主張笛福讚許塞利姆斯只因軍人稍微偷懶就將其殺害，是對於軍紀以及君主權力的欣慕，但是從原文以及其他對於塞利姆斯的描述看來，笛福

<sup>43</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5, p. 465.

<sup>44</sup> Manuel Schonhorn, *Defoe's Politics: Parliament, Power, Kingship and "Robinson Cruso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

<sup>45</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8, p. 656. 培根同樣借用諾斯的作品作為材料根據，見 Francis Baco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 with Prefaces and Notes by the Late Robert Leslie Ellis, Together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Principal Latin Pieces* (London: Longman & Company, 1861), pp. 757-759.

<sup>46</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8, p. 656.

對於這位君主的批判遠高於尊敬，且其原文是在批判君主的暴虐無道，與肖恩的說法不相符。

笛福以君主突然死亡作為上帝的憤怒以及祂干預世界的證據，這種論證方式並不僅只出現於他對古代歷史的闡述，還體現於他對十六、十七世紀西歐歷史的解釋，例如笛福認為英格蘭女王瑪麗一世（Mary I, 1516-1558）的死便是她殘酷迫害新教徒所造成的結果，上帝不讓她好死故而讓她病死；又如笛福對於路易十四的描述，路易十四一直是笛福批評普遍王權（universal monarchy）野心的首要箭靶，他不只是單純地鑑於當時英法局勢才批評路易十四，其實包括上述對於古代君主的批評也都是要用來批判路易十四的對外擴張政策，而路易十四的兒子與孫子都比他還要早死，這在笛福的解釋當中便是上帝介入人世的恰當範例，他說上帝「親手」來懲罰法國天主教政權的不公不義。<sup>47</sup> 從相反的例子來看，威廉三世與瑪麗二世也被笛福解釋為上帝的工具，因為他們對抗「世界上的迷信以及壓迫，並且把國內的專制」給掃除。

在笛福的個人經歷中，1688 年的革命無疑是正當且神聖的，即使基督徒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忍受暴君，這也是因為「基督徒服從殉道，耐心受苦，是正當的」。<sup>48</sup> 儘管如此，但笛福認為若從上帝對世界的愛來解釋，那麼人類對痛苦的忍耐不應該是毫無限度的。雖然笛福沒有明確地強調人民具備推翻現有政府的權力，但他仍指出，一旦君主因為濫用權力而被一個更公正的領導人取代時，那麼基督徒臣民就應該接受這個取而代之的領導人：「當人民的意願迎接了推翻暴君之人時，基督徒應該承認人民的反抗，對新領袖同等的服從」。<sup>49</sup> 很明顯，笛福指的是 1688 年的光榮革命。笛福總能找到理由為威廉三世奪取王位辯護，他認為這一發展是符合上帝的承諾，像是威廉三世登陸英格蘭的 11 月 5 日這天正是 1605 年火藥陰謀（Gunpowder Plot）失敗的紀念日，可見上帝是擘劃一切的主導者，而威廉便是祂幫助英格蘭人走出困境的「促成工具」（instrument）。笛福說：「人若是要理解上

---

<sup>47</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8, p. 659.

<sup>48</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6, p. 714.

<sup>49</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6, p. 715.



帝之良善，便必然要感謝威廉前來解救英格蘭之善意」。<sup>50</sup> 上帝將 11 月 5 日賜予威廉為「祝福與讚美」的日子，而 1688 年又是西班牙無敵艦隊戰敗的一百週年，所有這些宛如巧合般「同時發生的情況」被笛福視作證據來主張上帝能夠、也真切實際地對英格蘭歷史直接干預。<sup>51</sup>

光榮革命是上帝「在管理世界時常用的手法」<sup>52</sup>之體現。此外，「上帝以及奧蘭治親王，一位是主宰者，另外一位是工具，來幫助我們。所以我不可以帶奉承地說，沒有人可以信仰上帝之良善，而不感謝祂的善意」。<sup>53</sup> 在這樣的神意安排下，可謂幫助威廉三世者就是幫助神意者。不服從新教國教徒被描繪為當時不斷幫助威廉三世的人，所以他們也就是順從神意的人。英格蘭國教會信徒以及不服從國教會新教徒，在這個時刻，真心誠意地基於公共利益與教條而結合在一塊。對此，學者克雷格·羅斯（Craig Rose）便指出，十七世紀後期，多數英格蘭人皆認為上帝並不是創造了世界後便任其自我運行；相反的，他們相信上帝會直接干預甚至改變人類世界的現實事務。例如在當時有許多牧師的講道詞都認為英格蘭在道德上的低落會激怒上帝，從而導致英格蘭軍隊生病或衰弱。<sup>54</sup> 笛福的作品也屬於這樣的脈絡。例如笛福聲稱，1706 年英軍對於法軍的攻擊計劃本該是完美的，但是由於上帝不滿當時英格蘭人民的作為，故祂突然改變風向，迫使英軍行動暫停。另一方面，笛福也相信人們有時可以透過禁食以及禁慾來取悅上帝，進一步改變上帝的決定，因此如果法國人上教堂「跪下來禁食和祈禱」，同時英格蘭人卻大興土木興建戲院、發表褻瀆上帝之言論以及辱罵髒話，那麼在這種背景之下，法國贏得戰爭的勝利確實絲

---

<sup>50</sup> Daniel Defoe, *The Danger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Consider'd, from the Present Prospect of a Religious War in Europe* (London: n.p., 1701), p. 8.

<sup>51</sup> Daniel Defoe, *A Commendatory Sermon Preach'd November the 4th, 1709. Being the Birth-Day of King William, Of Glorious Memory* (London: J. Dutton, 1709), p. 2.

<sup>52</sup> Defoe, *Review*, 4:616. 參見 Matthew Adams, "Daniel Defoe and the Blooding of Britain. Genealogy,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a National Public,"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27, No. 1, 2004, pp. 4-5.

<sup>53</sup> Defoe, *The Danger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Consider'd, from the Present Prospect of a Religious War in Europe*, p. 8.

<sup>54</sup> Craig Rose, "Providence, Protestant Union and Godly Reformation in the 1690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ixth Series, No. 3, 1993, p. 162.

毫不令人意外。<sup>55</sup> 笛福指出，根據人類歷史上的戰爭，上帝確實是背後決定各種勝敗的最高決定者：「最高的無上力量，就是戰爭之神，是勝利唯一的賦予者」。<sup>56</sup>

笛福對於亨利七世的濃厚興趣，不只可以上溯到前文所提及他對於羊毛業的關心，同時也可以看到他如何理解英格蘭在歐洲的崛起及其如何受到上帝眷顧。笛福對於亨利七世的看法主要是根據約翰·斯皮德（John Speed，1552-1629）的《不列顛史》（*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Under the Conquests of Romans, Saxons, Danes, and Normans*，1611）以及培根的《亨利七世統治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1622），這點過去的研究者並未指出。<sup>57</sup> 此外，關於英格蘭羊毛產業的強大，笛福的資料來源則是彼得·海林（Peter Heylyn，1599-1662）所撰寫的《小宇宙》（*Mikrokosmos*，1621）。笛福認同該書所說：「英格蘭所有的羊毛、土地，都是由上帝來分派的」。換言之，羊毛以及與其相關的製造業都是上帝對於英格蘭的特別恩賜。笛福與海林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認為成立英格蘭羊毛業的關鍵人物是愛德華二世（Edward II，1284-1327），而笛福則認為羊毛業發展實則是從亨利七世統治時期（r.1485-1509）方開始得到妥善發展。<sup>58</sup>

我們接下來要追問：為什麼笛福要稱頌亨利七世統治下的英格蘭有卓越的羊毛業發展？笛福始終強調這源於亨利七世的統治，英格蘭之國力至此有了劃時代的突破性發展，而一個作為歐洲強權的英格蘭於焉出現。換句話說，這個國家的強大以及國王的成就正是奠基在亨利七世開始發展自己國內的羊毛製造業，並且出口經過本地加工的羊毛。笛福對於亨利七世的解釋與其對暴君的解釋同樣來自培根。培根

---

<sup>55</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3, p. 542.

<sup>56</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3, p. 571. 另見 Daniel Defoe,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20), in G. A. Starr, ed., *The Novels of Daniel Defoe*, Vol. 3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 p. 219.

<sup>57</sup>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under the Conquests of Ye Romans, Saxons, Danes and Normans. Their Originals, Manners, Warres, Coines & Seales: With Ye Successions, Lives, Acts & Issues of the English Monarchs from Julius Caesar, to Our Most Gracious Soueraigne King James* (London: John Dauuson, 1631); Francis Bacon,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 and Selected Works*, Brian Vicker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笛福在他早期的歷史劄記中抄錄了斯皮德的著作，見 P. N. Furbank and W. R. Owens,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1998), p. 264.

<sup>58</sup> Peter Heylyn, *Mikrokosmos. A Little 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World*, (Oxford: John Lichfield, 1625, 4<sup>th</sup> ed.), p. 464.

一樣強調亨利七世要發展英格蘭本土產業的決心，並稱讚英格蘭與法蘭德斯的合約是「讓偷懶被避免，而且停止我們本國的財富不斷地向外流失。」<sup>59</sup> 培根寫道：我們應該要將財富留在國內，因為黃金是最為稀少的。<sup>60</sup>

正如上述，笛福認為神意出現在人類生活的各種環境當中，英格蘭的羊毛產業在他眼中自然也充滿了宗教意義。笛福解釋英格蘭豐富的羊毛與其他資源皆為上帝賜予的祝福與禮物，<sup>61</sup>如果英格蘭人糟蹋這種禮物而不妥善利用，這無疑是在蔑視上帝。相反地，亨利七世將英格蘭優良的羊毛發揮得淋漓盡致方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因為他讓其子民「睜開眼睛」看清國家真實利益之所在。<sup>62</sup> 為了強化這種說法的重要性，笛福進一步嘗試將英格蘭羊毛之歷史根源再往上延伸。

在這樣的論述目的下，笛福開始將英格蘭都鐸王朝與腓尼基人的歷史連結起來。笛福對腓尼基人歷史的尊崇，正如我們在上文所討論的，此時變得有其更深的意義存在。笛福寫道，古代腓尼基人於海外探險時，曾經來到英格蘭將優秀羊毛運送回國，這也使得他們本國的商業更加興盛。當然，從二十一世紀的觀點來看，笛福這樣的說法缺乏有力的根據。然而，在笛福的敘事中，這種歷史上的淵源，重點是要強調英格蘭羊毛的優異性以及悠久的歷史。同樣是在歷史敘事中，腓尼基人被消滅後，後來羅馬統治英格蘭時則是直接出售英格蘭尚未加工的羊毛，所以使得英格蘭羊毛業逐漸退化，相對的，接受了大量英格蘭羊毛的法蘭德斯地區之羊毛業則蓬勃發展。然而，從這樣的發展中，笛福仍舊可以歌頌英格蘭：他指出法蘭德斯之羊毛產業之所以如此優越，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英格蘭的優秀原料。所以，當亨利七世開始發展本地的羊毛產業時，笛福盛讚他讓英格蘭妥善發揮了「上帝所給予的獨特禮物，讓他們可以完成在普世商業當中自己所應該扮演的角色」。<sup>63</sup> 同理，蘇格蘭在十七、十八世紀的貧窮其實也是上帝透露給他們的警訊：蘇格蘭人沒有妥善地

---

<sup>59</sup> Francis Bacon,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 and Selected Works*, p. 54.

<sup>60</sup> Francis Bacon,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 and Selected Works*, p. 68.

<sup>61</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 and Especially Consider'd as It Respects the British Commerce, as well at Home, a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Essays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Our Trade in Particular,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London: J. Baker, 1713), p. 36.

<sup>62</sup> Daniel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1728), in John McVeagh 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7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p. 204.

<sup>63</sup>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9, p. 217.

運用自己豐富的漁業資源，所以才讓自身陷入如此貧苦之處境，漁業正是上帝給予這個地區的恩賜。笛福批評他們浪費了上帝給予的祝福，這等同污蔑了神意，像是將放在「自己手心中的上帝祝福給拋棄掉」。<sup>64</sup>

## 伍、基督教會的發展與英格蘭宗教改革

本節接著討論笛福如何論述1688年後新政權之正當性，特別聚焦在他如何闡述基督教的興起、沈淪以及宗教改革後的教會之新生。笛福旁徵博引地指出教宗制度的建立充滿了血腥與欺騙，這樣子所建立起來的制度根本毫無正當性可言。在英格蘭宗教改革歷史中，像是瑪麗一世時代的英格蘭國教會教徒都是當時的不服從國教新教徒。因此笛福希望十八世紀的國教會成員可以反省他們的前人是如何被迫害，故不應該再迫害像是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貴格會（Quakers）等不服從國教新教徒。笛福批判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推動的宗教改革並不徹底；至於伊莉莎白一世仍然保留某些與天主教會十分類似的儀式和神職體系，雖然也受到笛福的批評，但由於女王帶給英格蘭的榮耀讓他與有榮焉，故其批評相對溫和。這也與上述腓尼基人海外貿易以及發展上帝所恩賜的羊毛業有所關聯。笛福稱讚亨利七世率先發展英格蘭之羊毛業，稱讚亨利八世發起宗教改革的首倡之功，那麼集二人正面事蹟於一身的伊莉莎白女王自然會是他最擁護的對象。

威廉三世與瑪麗二世被笛福認為是上帝所指派的工具（instruments），因為他們對抗詹姆斯二世被解釋成是在「打擊世界上的迷信以及壓迫，並且推翻國內的暴政」。光榮革命就是清楚闡明「神意對於世界上政府應如何推行與運作」的最好例證。<sup>65</sup> 再進一步而言，「上帝與奧蘭治國王，一個是構思者，另一位是工具，兩者

---

<sup>64</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 and Especially Consider'd as It Respects the British Commerce, as well at Home, a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Essays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Our Trade in Particular,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London: J. Baker, 1713), p. 36.

<sup>65</sup>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4, p. 616. 參見 Matthew Adams, "Daniel Defoe and the Bleeding of Britain. Genealogy,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a National Public," pp. 4-5.

都幫助我們。我不是在奉承，沒有人會比威廉對於上帝的善意有更深體悟，而且對於祂有更深之感謝」。<sup>66</sup> 當笛福回憶起詹姆斯二世在位的最後時光時，他經常將不服從國教新教徒描繪為不斷地協助新教徒以及荷蘭人起來對抗詹姆斯二世的角色。而且他會說，這個時候，「英格蘭國教會與不服從國教新教徒，他們齊心協力地加入一個新教的大團體，懷抱著相同的目標並且禍福與共，在教條上也有團結一致的立場，就算過去的意見環境有多麼不同。在這個時候只追求共同的自由，他們一同加入了這場被上帝所祝福的革命」。<sup>67</sup>

笛福之所以如此重述晚近一兩世紀的英格蘭歷史，背後有雙重意義。首先，他希望以此作為往後新教徒能夠共同和諧生活的願景機制。尤其是1688年之後，不服從國教新教徒與國教會短暫的合作關係又旋之停止，雙方不僅反目成仇，將彼此在1688年之所作所為批評得一文不值，而且英格蘭國教會也開始出台對於不服從國教新教徒的高壓緊縮政策，甚至高教會（High Church）人士更是不斷地發表煽動性的言論要迫害不服從國教新教徒。<sup>68</sup> 因此，笛福所提出不服從國教新教徒與英格蘭國教會合作的願景，其實同時也是笛福對於國教會偽善作為的批判，特別是他們居然還與歐陸的詹姆斯黨人唱和。其次則是反映了笛福對於高教會人士的反感。在他的解釋中，詹姆斯二世的垮台很顯然是上帝的計畫。所以笛福提醒高教會人士，威廉三世與瑪麗二世是上帝所指派的君主；由此他們對於兩位君主的不斷攻擊，其實等同褻瀆並且要瓦解深受上帝祝福的光榮革命。

在笛福歷史作品中討論到的宗教現象上，他始終相當關心的一點是，基督教是如何從被迫害的信仰轉變成羅馬帝國的國教，發展出後來興起的教宗制度。正如上述，笛福對於神意在歷史中的展現有他的詮釋方式，而當他討論基督教的崛起時，他注意到了宗教領袖中，曾經迫害過基督教的人往往會死於非命。笛福思考為什麼上帝要讓這些暴君死於非命，或者是年紀輕輕地就非自然死亡。從許多歷史歸納看

---

<sup>66</sup> Daniel Defoe, *The Danger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Consider'd, from the Present Prospect of a Religious War in Europe*, p. 8.

<sup>67</sup> Daniel Defoe, *A Short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in Britain* (London: n.p., 1707), p. 38. 此處粗體字由筆者所加註。

<sup>68</sup> 高教會（High Church），大體而言指的是英格蘭國教會中高度強調國王與官方教會權威的神職人員，他們重視聖禮、儀式，並且反對寬容不服從國教會的人士。

來，他認為最有可能的便是他們違背了上帝要讓基督教發展的意思。像是叛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31-363）之所以死於非命，是因為「他企圖要復興異教，並且顛覆君士坦丁（Constantinus I，272-337）的政策」。<sup>69</sup> 這些傷害基督教發展、傷害基督徒的君王們便有死於非命的危險。

當笛福在《舊約》中討論希伯來人的歷史時，他同時也在與英格蘭國教會的作家爭奪話語權。羅馬帝國的歷史是笛福與查爾斯·萊斯利（Charles Leslie，1650-1722）和路克·米爾伯恩（Luke Milbourne，1649-1720）等高教會派之間進行歷史解釋的另一個戰場。米爾伯恩在1702年之前是諾福克（Norfolk）郡奧斯曼迪斯頓（Osmandiston）擔任牧師，從1704年開始是倫敦的聖埃瑟爾伯加（St. Ethelburga）的教區牧師，他是一位好打筆仗的高教會神職人員，特別以其所發表的紀念查理一世的佈道辭和支持亨利·薩切維爾（Henry Sacheverell，1674-1724）而聞名。<sup>70</sup>

當他們辯論原始基督徒是否應該服從迫害其羅馬官員的命令時，米爾伯恩認為，根據歷史記載，這些基督徒毫無疑義地服從了行政長官的命令——那是應該的，因為在羅馬的歷史上，每個人都是無條件地服從他們上級的命令。但笛福很容易便在羅馬歷史上找到相反的案例，許多後來登上王位的皇帝都是以叛亂者的身份上台的，這證明歷史上所記錄的政治領袖絕非不可侵犯。笛福還說，「那些羅馬皇帝正是從……〔前任皇帝的〕反抗中獲得了他們的統治權和權力，他們用暴力把前任皇帝打倒了」。<sup>71</sup> 此外，笛福反駁米爾伯恩的說法，他指出，根據聖保羅的教導，保羅也會承認那些「曾經抵抗和鎮壓前代皇帝」者的合法性。<sup>72</sup> 笛福宣稱，原始的基督徒拒絕無條件的服從，而且他們反抗那些沒有合法性統治者的作為是具有完整正當性的。

如上所述，腓尼基文明的毀滅是神意的表現，因為這使其在藝術和科學方面的成就得以傳播到全世界。同樣，笛福也認為，既然世界是由上帝主宰，那麼宗教迫

---

<sup>69</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8, p. 656. 另見 Daniel Defoe, *The Compleat English Gentleman* (1728-29), in W. R. Owens, ed.,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by Daniel Defoe*, Vol. 1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7), p. 168.

<sup>70</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7, p. 49.

<sup>71</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6, p. 714, Vol. 7, p. 355.

<sup>72</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6, p. 715.

害——無論是在羅馬時代，還是在內戰後的時代，如蘇格蘭的誓約者(Covenanters)——都是「可悲的、令人震驚的神意」(sad and astonishing Providence)。他相信那些為信仰而犧牲的人將會得到回報，他還說，早期教會的殉道者或十七世紀蘇格蘭的誓約派為祂的名字作見證，都得到眾多恩典和榮耀，並且確認能得到「祂的救贖」。<sup>73</sup>

笛福總結說，「神聖的智慧總是認為適合用磨難和苦難來鍛鍊他的教會」。<sup>74</sup>上帝不會強迫人犯罪，然而，人民會被迫起來反對暴君的壓迫。保羅的訓誡並沒有禁止人們在所有情況下挑戰壓迫，他也沒有把反抗視同犯罪。笛福強調這種解讀方式將會「違背了上帝的本質和所有宗教的意義」。<sup>75</sup> 根據約翰·福克斯(John Foxe, 1516-1587)關於殉道者歷史的記載，笛福對古羅馬的那些殉道者表示敬意，讚揚那些願意犧牲生命而不妥協信仰的人們。這些虔誠的信徒「承受著最大的邪惡，而不是犯下最小的罪惡」。上帝會對這些行為感到高興，認為它們是「可接受的犧牲」和「理所當然的事奉」(reasonable service)。<sup>76</sup> 笛福欽佩那些：

為正義事業而死的烈士，他們不是因為拒絕為國王祈禱而死；而是因為他們寧願了斷生命，也不去違反他們對信仰的服從，這是每個基督徒應該堅持的原則。<sup>77</sup>

笛福對羅馬歷史的思考也與英格蘭當時的情況密切相關。保羅主張服從行政長官的教誨適用於大多數常規情況，然而，在迫不得已的時候，反抗權威並不違反正義。

除了迫害基督徒的歷史之外，教宗制度的興起是笛福感興趣的另一個話題。他引用並同意不服從國教新教徒牧師大衛·克拉克森(David Clarkson, 1622-1686)的言論，即在十八世紀，主教的原意類似於教區牧師。目前的主教制度已經被扭曲了，它與基督時代的初衷相去甚遠。主教不應該是一個行政人員，遑論是一個貴族，

---

<sup>73</sup> Daniel Defoe, *Memoirs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1717)*, in N. H. Keeble, ed.,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Vol. 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p. 217.

<sup>74</sup> Daniel Defoe, *Memoirs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1717)*, p. 215.

<sup>75</sup> Daniel Defoe, *Jure Divino (1706)*, p. 170.

<sup>76</sup> Daniel Defoe, *Memoirs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1717)*, p. 216. 此典出自於《羅馬人書》十二章一節。

<sup>77</sup> Daniel Defoe, *Memoirs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1717)*, p. 215.

他理當僅僅是一個教區的牧師。笛福認為，這種對主教存在意義與目的之扭曲始於西元三世紀之後。他引用克拉克森和勞德(William Laud, 1573–1645)的話：「世界上第一個主教教會是長老制度的教會」。<sup>78</sup> 也就是說，當時的神職人員並不像現在的主教那樣是領導者，一個教會的實際領導者是長老會，即教會的長老們。「羅馬教會曾經是一個真正的基督教會」，但若認為它是高於其他教會的最高教會則是有違於真理的。<sup>79</sup> 笛福對這種墮落進行了反思，他將教宗制度的肇始追溯到君士坦丁合法化基督教的措施。

雖然君士坦丁合法化基督教對基督徒來說是個好消息，但這種合法化也自相矛盾地給「他們〔作為祭司〕的驕傲帶來了」錯誤的鼓勵。<sup>80</sup> 笛福認為皇帝出於虔誠改變了對基督教的政策，但這種政策導致神職人員獲得過度的權力。笛福的解釋是十七世紀下半葉新教的標準敘事，這種說法認為，主教和教宗的建立導致基督徒從原始的虔誠墮落為對教宗制度的支持。皇帝出於虔誠而授與教會太多權力，這一措施反而促成後來教宗制度的興起，導致教派的分裂和隨之而來的爭執。更糟糕的是，由此造成的宗教和世俗事務之間的混亂，使教宗濫用權力的程度更加嚴重。

在討論羅馬歷史時，笛福認為，沒有合理的證據表明羅馬主教比其他主教和神職人員更優越。此外，普芬道夫認為，教宗制度的目的完全是人為的，根本就沒有什麼神性在其中。他還說，「沒有任何神聖制度的蹤跡可尋……也無法提出任何理由，為什麼羅馬主教」擁有最高的地位。<sup>81</sup> 笛福也有類似的觀點。這一制度是在基督升天後的幾個世紀當中才逐漸形成的。這一種人為的發明「被傳統、創新和人性的發明所腐蝕，並逐漸退化成了一團錯誤和迷信」。<sup>82</sup> 笛福也認同普芬道夫所說，即彼得之首要地位（彼得磐石說〔*Primacy of Peter*〕），這個羅馬教會捍衛教宗合法性最經常被引用的理由，其實僅是一種合理化說詞，並非真的是根據《聖經》經文。

---

<sup>78</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4, p. 810, Vol. 5, p. 421.

<sup>79</sup> Daniel Defoe, *The New Family Instructor* (1727), p. 108.

<sup>80</sup> Daniel Defoe, *The New Family Instructor* (1727), p. 73.

<sup>81</sup> Samuel Pufendorf,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Kingdoms and States of Europe* [1695], in Michael J. Seidler, ed., Jodocus Crull tran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2013), p. 441.

<sup>82</sup> Daniel Defoe, *A Continuation of Letters Written by a Turkish Spy at Paris* (1718), in David Blewett, ed., *Satire Fantasy and Writ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Vol. 5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5), p. 121.



儘管笛福嚴厲批評了教宗制度，但他並不反對羅馬時代的教士制度。在笛福的理解中，羅馬的主教與新教教會的牧師類似。他讚揚了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混亂時期中，仍堅守教會的那些主教之勇氣。笛福認為，上帝很滿意「他們的虔誠」，並同意這是「可被接受的犧牲」和「合理的付出」。<sup>83</sup> 笛福的核心主張是，基督徒必須找回被教宗制度所玷污的原始基督教精神，而這正是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加爾文(Jean Calvin, 1509-1564)等人發起宗教改革之重要性所在。由於笛福對這兩位宗教領袖的描寫不多，以下將重點討論他對英格蘭宗教改革的看法。儘管笛福經常攻擊阿里安派(Arians)、索西尼派(Socinians)和伯拉糾派(Pelagians)等異端，但他很欣賞在馬丁·路德之前便發難針砭羅馬教廷的領導人物，如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20-1384)和約翰·胡斯(John Hus, 1372-1415)，並稱他們是「首先看到……〔教宗制〕的虛構性，開始向世界揭穿它們」的人。笛福說，威克里夫是「英格蘭宗教改革的第一位傳教士」，此外，「洛拉德派(Lollards)、威克里夫派(Wickliffians)、胡斯派(Hussites)」都是宗教改革的先驅者。法國的瓦爾德派被讚譽為「一個痛苦、誠實、勤勞的民族」。上帝向「瓦爾德人(Waldenses)、阿爾比根人(Albigenses)和其他受苦的基督徒」展示了「真正的光明」。<sup>84</sup>

當然，除了支持宗教改革的合法性之外，笛福還運用宗教改革這段歷史來為十八世紀勇敢拒絕服從英格蘭國教會的新教徒辯護。他書中反覆提到的一個論點是，像胡斯或威克里夫這樣的人物，基本上就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不服從國教新教徒。在1688年革命之前，不服從國教新教徒因其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笛福認為他們是求仁得仁，對於種種迫害已有心理準備。不過在光榮革命之後，由於有了新的宗教寬容政策，不服從國教新教徒的信仰自由不再受到限制，也不再需要擔憂受到迫害。笛福透過重述宗教改革之歷史來提醒讀者，英格蘭國教會其實在亨利八世時代同樣是異端、分裂份子，而他們居然在當權之後反過來迫害那些不願意服從國教會規範的其他教派新教徒。<sup>85</sup>

<sup>83</sup> Daniel Defoe, *Memoirs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1717), p. 216.

<sup>84</sup> Daniel Defoe, *A Short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in Britain*, p. 4.

<sup>85</sup> Daniel Defoe, *A New Test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s Loyalty* (1702), in W. R. Owens, 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3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p. 63.

當笛福關注亨利八世的統治時，他注目的肯定是宗教改革。笛福並不承認宗教改革真是亨利努力的成果；相反的，這種改革是亨利八世在沈迷於滿足自身慾望時，非預期地造成的，上帝利用「他作為工具，但並未賦予他作為基督君主應有的原則」。<sup>86</sup> 在笛福的歷史思維中，即便是人類所犯下最為惡劣、邪惡的計畫，都可能同時是在完成上帝所安排他所完成的光榮目的。<sup>87</sup> 亨利八世便是當中的最佳例證。這種歷史判斷與當時代另一位作家吉爾伯特·伯內特（Gilbert Burnet, 1643-1715）的評價非常相似，伯內特寫道：

如果我們考慮到他所做的大事，我們必須承認，上帝有一個明顯的天意，即興起一個他這種脾氣的國王，為後來的祝福清出道路……在上帝的神意中，運用那些犯過許多大錯的君王來完成其旨意，這既不是新鮮事，也非稀奇之事。<sup>88</sup>

笛福還說，儘管亨利八世的統治似乎充滿了許多麻煩，但他承認：「上帝的天意在這些混亂中奇妙地製造了秩序，在所有這些邪惡中製造了善，但我認為，無論是混亂本身，還是天意的奇妙聯繫，都是為了他（亨利八世）的榮耀和公眾的利益而發出的。」<sup>89</sup>

笛福的歷史評論不僅顯示他的廣泛閱讀，而且還反映出他整合不同材料的天才。笛福的另一個資料來源是愛德華·赫伯特（Edward Herbert, 1583-1648）的《亨利八世的生平和統治》（*The Life and Raigne of King Henry the Eighth*）。<sup>90</sup> 當笛福在《王家教育》（*On Royal Education*）中討論亨利八世及其子女的教育問題時，他的材料主要來自赫伯特的書籍。與赫伯特的判斷相呼應，笛福認為亨利的改革是不完整的。湯瑪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 1473-1530）是笛福反復批判的對象。他聲稱，沃爾西「根本沒有減輕人民的痛苦，反而增加了他們的痛苦」。雖然國王

---

<sup>86</sup> Daniel Defoe, *A Short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in Britain*, p. 6.

<sup>87</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4, p. 141.

<sup>88</sup> Gilbert Burnet, *Bishop Burnet's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R. Priestley, 1820), pp. xvii, xx.

<sup>89</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4, p. 134.

<sup>90</sup> Edward Lord Herbert of Cherbury, *The Life and Raigne of King Henry the Eighth* (London: Thomas Whitaker, 1649).

處死沃爾西的決定是正確的，但改革的成果整體而言並不能算得上成功，因為改革並未徹底落實。這樣子未完成的宗教改革，反而使得「英格蘭國教會內部被改革成主教制和龐大的等級制度，而不是加爾文主義的平等」。<sup>91</sup>

當笛福批評亨利八世留下的不完整改革結果時，他也正是在評價他自己所處時代下的英格蘭國教會。英格蘭國教會的制度被描述為是在孵育「教會之暴政」，這便是上述未完成的改革所造成之惡果。笛福認為，真正的改革直到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1537-1553）才真正開始。他聲稱：「我們第一次改革掉教宗制是在國王愛德華六世的時代。我之所以稱其為第一次，因為在他的領導下，整個國家和政府都接受了新教改革的宗教；這種新教是由這位對信仰充滿熱情的國王和當時的國會建立的，以法律的力量為後盾，並且賦予其權威，它在這時開始被稱為英格蘭國教會」。<sup>92</sup>

由於女王瑪麗一世極力企圖逆轉亨利八世與愛德華六世對教會的改革，並且追求恢復天主教的地位，英格蘭的宗教改革在此時尚未取得顯著成果。如上所述，瑪麗一世和其他迫害新教徒的君主被描述為受到上帝的譴責而死於非自然原因。相反，笛福對那些被迫害的基督徒，無論是在羅馬帝國時代還是在瑪麗時代，都給予高度評價。笛福敬重死於瑪麗一世統治時期的神職人員，如「那位光榮的殉道者尼可拉斯·雷德利（Nicholas Ridley, 1500-1555）」和約翰·胡珀（John Hooper, 1495-1555）。<sup>93</sup> 笛福說，他們是「宗教的基本要素」，他們「在傳教中不斷努力，具有堅定不移的信仰，在基督教的傳教事業中具有極高毅力，並且用他們的鮮血完成了宗教改革」。<sup>94</sup> 另外，笛福在《大不列顛全島遊記》（*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中記錄下當他途經南薩福克（South Suffolk）的哈德利（Hadley）時，特地前往羅蘭德·泰勒（Rowland Taylor, 1510-1555）的雕像前憑弔，羅蘭德是瑪麗一世統治時期的英格蘭國教殉道者，笛福肯定道，當地人們對他的記憶將一

<sup>91</sup> Daniel Defoe, *A Short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in Britain*, p. 8.

<sup>92</sup> Daniel Defoe, *A New Test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s Loyalty* (1702), p. 62.

<sup>93</sup> Robert Merrett, *Daniel Defoe: Contrarian*, p. 115.

<sup>94</sup> Daniel Defoe, *A Short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in Britain*, p. 9.

直在「心中……只要這座島繼續維持新教信仰」。<sup>95</sup> 笛福也接著指出，雖然他不欣賞英格蘭國教會的等級制度，但他認為所有新教教會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似的。不服從國教新教徒與英格蘭國教會的親近性，遠大於天主教徒與英格蘭國教會的關係。笛福因此相信，只要英格蘭國教會放鬆對不服從國教新教徒的壓力，他們的分歧便一定能以某種方式得到化解。他認為，不同的新教教派，在「信仰的根雖然都是健全的，但有可能彼此所開出的花朵之香味不同」，這個意思就是說，「信仰、希望、愛和其他基督教的恩典可能在各個新教教派中皆被保留下來，而它們在不同環境中有不同的模樣」。<sup>96</sup>

在瑪麗一世短暫而動蕩的統治之後，她的繼任者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推動了中庸之道（Via Media）的宗教政策。儘管伊莉莎白沒有清除英格蘭國教會中殘餘的天主教習俗，但笛福為女王的中庸宗教政策辯護，他解釋女王將天主教儀式與新教混合的決定時說，她「是一位嫺熟政治的女王，其四周佈滿了敵人」。<sup>97</sup> 在他的解釋中，伊莉莎白一世雖然心中不願意採取這一措施，但為了維護新教事業，她仍願意實施此兼容政策。當笛福提到清教徒在她統治期間受到的迫害時，更可以清楚看出笛福對於伊莉莎白一世的明顯偏袒，他的評論簡短且輕描淡寫，只說：「像她這樣的好女王，[她]還是有將一些人置於死地」。<sup>98</sup> 在其他地方，笛福寫道，如果說女王「在某件事情上比一般人更暴虐，那便是在宗教問題上，有些人因為這原因而死於非命。在這件事情上既然我無法為其辯護，那我只能選擇緘口不語了」。<sup>99</sup>

笛福認為，伊莉莎白一世「在宗教儀式的改革中」逐步遠離天主教，而不是直接「破壞它們」，其實是更為恰當穩重。雖然女王的宗教政策往往源於她對激進、快速的改革猶豫不決，但是笛福同時暗示，「她天生的性情溫和，使她非常喜歡宗教的裝飾和表演」，這可能是她不直接破壞天主教式宗教儀式的另一個因素。<sup>100</sup> 女王「寧願在宗教改革中走回頭路，也不願意把它更加深化；我指的深化

<sup>95</sup>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Volume 1* (1724), in John McVeagh, ed.,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Vol. 1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p. 92.

<sup>96</sup> Daniel Defoe, *A Short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in Britain*, p. 9.

<sup>97</sup> Daniel Defoe, *A New Test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s Loyalty* (1702), p. 62.

<sup>98</sup> Daniel Defoe, *A New Test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s Loyalty* (1702), pp. 62–63.

<sup>99</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4, p. 151.

<sup>100</sup> Daniel Defoe, *A Short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in Britain*, pp. 8–9.

便是指愛德華國王的作法」。<sup>101</sup> 儘管笛福的作品中亦曾零星地批評過女王，因為她「確實對那些不同意她施政措施的人採取了非常嚴厲的措施」，但他對女王的總體評價是相當正面的。<sup>102</sup>

笛福偏愛伊莉莎白一世可從前面他認為羊毛是上帝的禮物的討論來看。首先，笛福認為自亨利七世以來建立的羊毛製造業是上帝對英格蘭計劃的一部分，而打從1489年，亨利七世開始鼓勵英格蘭的製造業，直到1587年，伊莉莎白一世時期可以說終於看到它臻至完美，這項偉大的工作正在推進。<sup>103</sup>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和女王的英明治理，製造業獲得了成功，這清楚闡明了英格蘭對上帝計劃的虔誠。其次，笛福認為英格蘭商業和製造業的黃金時代可以追溯到「伊莉莎白一世統治的中期」。上帝對英格蘭的承諾也在佛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 1540-1596）、沃爾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等人獲得女王贊助下所進行的探險中體現出來。<sup>104</sup> 同樣的想法，也反映在笛福將百慕達等許多島嶼的發現和統治描述為「偉大而奇特的神意」。<sup>105</sup>

笛福對斯圖亞特王朝歷史的關注，集中在他們如何維持或是化解伊莉莎白一世宗教政策尚未解決之問題。雖然，不服從國教新教徒在伊莉莎白一世的時代也會因為不服從國教會的規範而受到迫害，但是笛福指出，在詹姆士一世即位後，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笛福支持伊莉莎白一世，宣稱即使女王迫害天主教徒，但是她並未完全禁止後者擔任公職的權利；笛福明顯偏愛女王，甚至當伊莉莎白一世對天主教徒

---

<sup>101</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4, p. 151.

<sup>102</sup> Daniel Defoe, *A Short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in Britain*, p. 10.

<sup>103</sup> Daniel Defoe, *A Plan of English Commerce* (1728) in John McVeagh, 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7, p. 192.

<sup>104</sup> Daniel Defoe, *A Brief Deduction of the Original, Progress, and Immense Greatness of the British Woollen Manufacture: With an Enquiry Whether It Be Not at Present in a Very Declining Condition: The Reasons of Its Decay; and the Only Means of Its Recovery* (London: J. Roberts, 1727), p. 26.

<sup>105</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 and Especially Consider'd as It Respects the British Commerce, as well at Home, a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Essays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Our Trade in Particular, for the Month of June* (London: J. Baker, 1713), p. 40.

採取強硬措施時，他還辯稱這是出於「國家福祉而不是宗教的原因，而迫使她不得不粗暴地對待他們」。<sup>106</sup>

總之，笛福對歷史上迦太基人和腓尼基人的欽佩，實質上是他對十八世紀英格蘭人的讚美。這種讚美從他所說的「腓尼基人是那個時代的英格蘭人」便可看出。<sup>107</sup> 而笛福之所以賦予英格蘭羊毛的悠久歷史及其與古代腓尼基人航海的聯繫，是他嘗試為英格蘭賦予更多合法性，並為伊莉莎白一世獲得上帝之祝福提供佐證。笛福對斯圖亞特王朝的評價很低，他寫道：「……女王伊莉莎白去世後，當詹姆士一世登上王位時，事情立即開始發生了新的變化」。<sup>108</sup> 詹姆士一世的宮廷充滿了「過度的虛榮和奢侈」，而當不列顛內戰爆發後，「在他兒子的統治下，造成了不列顛貴族的毀滅，並迫使他們成為這個時代性的錯誤的奴隸」。<sup>109</sup> 在笛福的其他段落中，當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同時出現時，他通常會對伊莉莎白一世有更正面的說法。<sup>110</sup>

伊莉莎白一世統治時期，英格蘭對於歐洲以外世界的探索正快速擴張，促使笛福強調「迦太基人是第一個到達北美的歐洲民族」這個假設，而英格蘭人（十八世紀的腓尼基人）正在恢復腓尼基這個古代民族被遺忘的成就。笛福根據自己所蒐集到的歷史材料指出，迦太基被羅馬打敗後，有些殘部逃到英格蘭，並且將航海與商業的種子帶到這裡來延續下去。相反地，迦太基（廣義的腓尼基人）本地原有的商業成就在羅馬人征服此地之後便被廢棄，因為羅馬人不屑於貿易，於是這些商業上的成就又「沈淪回它們原來的蒙昧狀態」。<sup>111</sup> 伊莉莎白一世統治時期的英格蘭恢復並超越了這所有成就。正如本文前幾節所討論的，在商業各方面具備高度成就的

<sup>106</sup> Daniel Defoe, *Peace without Union. By Way of Reply, to Sir H---- M----'s Peace at Home. The Fourth Edition. To Which Is Added a Preface* (London: n.p., 1704), p. 5.

<sup>107</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pp. 74, 76.

<sup>108</sup> Daniel Defoe, *The Great Law of Subordination Consider'd* (1724), in J.A. Downie, ed.,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p. 70. 另見 Daniel Defoe, *A Brief Reply to the History of Standing Armies* (1698), in P. N. Furbank, 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1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pp. 86-87.

<sup>109</sup>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3, p. 64.

<sup>110</sup> Daniel Defoe, *The Poor Man's Plea* (1698), in J. A. Downie, ed.,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7), p. 26.


<sup>111</sup>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p. 75.

腓尼基人之所以衰落和墮落，主要是由於他們的異教信仰，而這個關鍵問題在近代英格蘭獲得了解決。英格蘭人不僅是基督教徒，而且是新教徒。英格蘭人一方面繼承了腓尼基人的商業遺產，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徹底糾正了腓尼基人受到懲罰的原因。笛福認為，今日的英格蘭無疑是上帝所揀選的國家，他們有效運用上帝賦予其商業發展上的有利條件，而英格蘭在商業上的成功便是上帝對他們喜愛的見證。此外，英格蘭人選擇脫離腐敗的羅馬教會而落實在宗教改革，更進一步加強了上帝對他們的祝福。

## 陸、結論

本文的主題是笛福之歷史思想，特別關注他為了推動不服從國教新教徒之宗教自由、致力於光榮革命後新教政權之穩定、推崇優先發展商業等政治目標，而去剪裁並具原創性地詮釋史料。此外，本研究不同於過去研究者之處在於特別注意到笛福討論歷史時所參考的書籍，藉此除了更深入明白笛福閱讀的廣度以外，也具體指出笛福如何剪裁史料以為己用，而非逐字逐句地照抄史料。笛福對於歷史的討論中就宗教層面有深刻之觀察，他認為關注人類歷史的發展是理解上帝意志的一個重要提示手段。有別於時對異教徒腓尼基人的負面看法，笛福獨到地指出，上帝對於每一個民族都有其特定目的，因此即使是異教徒也可能對基督教國家有所幫助。他對腓尼基人在航海和貿易方面的成就特別感興趣，因為腓尼基人在貿易上的卓越表現闡明了上帝對他們的特別祝福。而自十七世紀以降在貿易上亦有傑出表現的英格蘭，便被笛福認為是此古老民族之繼承者，同理也是受到上帝的特別祝福。

腓尼基人在商業發展、貿易探索上成就不凡，雖然他們因為是異教徒而終不免遭到滅亡，但是已經替日後英格蘭的發展開創出了一條路。笛福相信希伯來人是上帝的選民，除了從《聖經》經文，笛福的歷史思想亦表現在他論述人類最早使用的文字來自摩西的兩塊石板，他堅持摩西和希伯來人是直接從上帝那裡獲得字母知識，而希伯來人的這種天賦證實了其作為選民的地位。笛福認為，從英格蘭在他那個時代取得的進步來看，英格蘭是這兩個古老民族的真正繼承者。

本文最後一部分以幾個實例說明笛福如何詮釋神意在歷史中的展開與呈現。笛福認為英格蘭在宗教改革後的日趨富強是上帝的特殊旨意，只要我們仔細閱讀，人類歷史中充滿了神的意志。例如，迫害英格蘭新教徒的瑪麗一世，被笛福解釋為因其不當之暴政而受到上帝懲罰，無法壽終正寢。在笛福眼裡，英格蘭國教會教徒在瑪麗一世統治時期是被迫害者，然而他們受到上帝之眷顧，得以從壓迫中解放。鑒於這段苦難的歷史，當他們重新獲得官方教會地位時，他們更不應該迫害新一代的異議者。笛福便是從英格蘭晚近歷史的重要事件中，詳細觀察並闡述神意，進而以此為正當性基礎，捍衛威廉三世與瑪麗二世在1688-1689年後建立的，支持宗教寬容的新政權。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

- Bacon, Francis. *The Essays, or Councils, Civil and Moral, of Sir Francis Bacon, Lord Verulam, Viscount St. Alban. With a Table of the Colours of Good and Evil. And a Discourse of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London: H. Herringman, 1696.
- Bacon, Francis. Brian Vickers, ed.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VII and Selected Wor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acon, Francis.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Francis Bacon, with Prefaces and Notes by the Late Robert Leslie Ellis, Together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Principal Latin Pieces*. Longman & Company, 1861.
- Burnet, Gilbert. *Bishop Burnet's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6 Vols. London: R. Priestley, 1820.
- Defoe, Daniel. *A Brief Deduction of the Original, Progress, and Immense Greatness of the British Woollen Manufacture: With an Enquiry Whether It Be Not at Present in a Very Declining Condition: The Reasons of Its Decay; and the Only Means of Its Recovery*. London: J. Roberts, 1727.
- Defoe, Daniel. *A Commendatory Sermon Preach'd November the 4th, 1709. Being the Birth-Day of King William, Of Glorious Memory*. London: J. Dutton, 1709.
- Defoe, Daniel. *A Continuation of Letters Written by a Turkish Spy at Paris (1718)* in David Blewett ed. *Satire, Fantasy and Writ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by Daniel Defoe*. Vol.5.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5.
- Defoe, Daniel.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in P. N. Furbank ed.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Vol. 4.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 Defoe, Daniel.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 and Especially Consider'd as It Respects the British Commerce, as well at Home, a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Essays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Our Trade in Particular, for the Month of August*. London: J. Baker, 1713.
- Defoe, Daniel.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 and Especially Consider'd as It Respects the British Commerce, as well at Home, a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Essays upon the Improvement of Our Trade in Particular, for the Month of June*. London: J. Baker, 1713.
- Defoe, Daniel. *A New Test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s Loyalty (1702)*, in W. R. Owens 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3.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 Defoe, Daniel.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1728)* in John McVeagh 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7.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 Defoe, Daniel. *A Short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in Britain*. Edinburgh: n.p., 1707.
- Defoe, Daniel. *A System of Magick* (1727) in Peter Elmer ed., *Satire, Fantasy and Writ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by Daniel Defoe*, Vol. 7.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 Defoe, Daniel.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Volume 1* (1724) in John McVeagh ed.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Vol. 1.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 Defoe, Daniel. *An Essay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Press* (1704), in P. N. Furbank and W. R. Owens e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8.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 Defoe, Daniel. *An Essay upon Literature* (1726), in P. N. Furbank ed.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Vol. 4.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 Defoe, Daniel. *Defoe's Review*. Edited by John McVeagh. 9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 Defoe, Daniel. *Jure Divino* (1706) in P. N. Furbank ed. *Satire, Fantasy and Writ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by Daniel Defoe*, Vol. 2.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 Defoe, Daniel. *Memoirs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 (1717), in N. H. Keeble ed.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Vol. 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 Defoe, Daniel. *Peace without Union. By Way of Reply, to Sir H---- M----'s Peace at Home. The Fourth Edition. To Which Is Added a Preface*. London: n.p., 1704.
- Defoe, Daniel.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20), in G. A. Starr ed. *The Novels of Daniel Defoe*, Vol. 3.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
- Defoe, Daniel. *The Compleat English Gentleman* (1728-29), in W. R. Owens ed.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by Daniel Defoe*, Vol. 1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7.
- Defoe, Daniel. *The Danger of the Protestant Religion Consider'd, from the Present Prospect of a Religious War in Europe*. London: n.p., 1701.
- Defoe, Daniel. *The Great Law of Subordination Consider'd* (1724), in J.A. Downie ed.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 Defoe, Daniel. *The New Family Instructor* (1727), in W. R. Owens ed.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3.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 Defoe, Daniel. *The Poor Man's Plea* (1698), in J. A. Downie ed.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7.
- Lord Herbert of Cherbury, Edward. *The Life and Raigne of King Henry the Eighth*, London: Thomas Whitaker, 1649.
- Heylyn, Peter. *Mikrokosmos. A Little 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World*. 4th ed. Oxford: John Lichfield, 1625.

- Howe, John. *A Sermon Preach'd Febr. 14. 1698. And Now Publish'd, at the Request of the Societies for Reformation of Manners in London and Westminster*. London: S. Bridge, 1698.
- Huet, Pierre-Daniel. *The History of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Ancients*. London: B. Lintot and W. Mears, 1717.
- Moréri, Louis. *The Great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Genealogical and Poetical Dictionary*. Translated by Jeremy Collier. London: Henry Rhodes, 1701.
- Pufendorf, Samue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Kingdoms and States of Europe [1695]*. in Michael J. Seidler ed. Translated by Jodocus Crull.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2013.
- Raleigh, Walter.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Walter Burre, 1614
- 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Proposals for a National Reformation, of Manners: Humbly Off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Our Magistrates & Clergy*. London: John Dunton, 1694.
- Speed, John.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under the Conquests of Ye Romans, Saxons, Danes and Normans. Their Originals, Manners, Warres, Coines & Seales: With Ye Successions, Lives, Acts & Issues of the English Monarchs from Julius Cæsar, to Our Most Gracious Soueraigne King James*. London: John Dauuson, 1631.

## 二、專書

- Ahnert,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Faith and the Reform of Learning in the Thought of Christian Thomasius*.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6.
- Ashworth, William J.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State, Knowledge and Global Trad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7.
- Backscheider, Paula R. *Daniel Defoe: Ambition & Innovation*.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6.
- Clark, Katherine. *Daniel Defoe: The Whole Frame of Nature, Time, and Provide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7.
- Douglas, Aileen. *Work in Hand: Script, Print, and Writing, 1690-18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Furbank, P. N., and W. R. Owens.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1998.
- Hone, Joseph. *Literature and Party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Queen An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Merrett, Robert James. *Daniel Defoe: Contrari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 Schonhorn, Manuel. *Defoe's Politics: Parliament, Power, Kingship and "Robinson Cruso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Walsham, Alexandra. *Providen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三、期刊論文

Adams, Matthew. "Daniel Defoe and the Blooding of Britain. Genealogy,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a National Public," *Journal for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27, No. 1, 2004, pp. 1-15.

Bernard, Stephen. "After Defoe, Before the Dunciad: Giles Jacob and A Vindication of the Press,"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Vol. 59, No. 241, 2008, pp. 487-507.

Levitin, Dmitri. "John Spencer's *De Legibus Hebraeorum* (1683-85) and 'Enlightened' Sacred History: A New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76, No. 1, 2013, pp. 49-92.

Novak, Maximillian E. "A Vindication of the Press and the Defoe Cano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Vol. 27, No. 3, 1987, pp. 399-411.

Reed, Joel. "Nationalism and Geoculture in Defoe's History of Writing,"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56, No. 1, 1995, pp. 31-53.

Rose, Craig. "Providence, Protestant Union and Godly Reformation in the 1690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Sixth Series*, No. 3, 1993, pp. 151-170.

Scoville, Warren C. "Minority Migrations and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No. 4, 1951, pp. 347-360.

### 四、專書論文

Furbank, P. N. "Introduction." in P. N. Furbank ed.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2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pp. 1-16.

Pigney, Stephen J. "Theophilus Gale and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in Tom Sorell, Graham Alan John Rogers, and Jill Kraye eds. *Insiders and Outside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76-98.

（責任編輯：林彥宏、許恕）